

# 民国杭州新闻史稿

何扬鸣 / 著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

杭州

# 民国杭州新闻史稿

何扬鸣 / 著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课题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杭州新闻史稿 / 何扬鸣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3. 9

ISBN-978-7-80758-789-7

I. ①民… II. ①何… III. ①新闻事业史—杭州市—民国 IV. ①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6224号

# 民国杭州新闻史稿

何扬鸣 / 著

- 
- 责任编辑** 陈晓蓓 齐桃丽  
**装帧设计**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印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31.75  
**字数** 460千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58-789-7  
**定价** 75.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 孙忠焕

**副主任** 赵光育 熊恩生 宋 涛 袁成毅 王利民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新德 陈江明 张学继 项文惠 夏卫东

倪素浓 陶水木

**主编** 孙忠焕

**副主编** 宋 涛 袁成毅 王利民

## 总 序

民国时期是我国纷繁错综之秋，杭州和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革命、发展、抗战、内战和解放的历程，在历史风云的挫折蹒跚中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民国杭州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版图上的重要城市，涌现出了众多知名人物，也发生了不少举国瞩目的大事。

1911年杭州光复，结束了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随后不久杭州又成为新旧军阀统治浙江的据点和中心，相继建立了政权。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杭州顺应民主和时代的潮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身近代民族工业的热情，在杭州以丝织业为主的轻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并开辟了城站新商业区和湖滨新市场，形成了都市新的商业格局。受革命思想的激励，杭城出现不少近代报刊，为积极传播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发挥了作用；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各式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浙江图书馆的创办更是杭州乃至全省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这些变化与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杭州在全省的地位、在全国的影响。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光复后杭州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的城墙以及剩余旗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道路建设。这项计划打开了封闭的城市空间，加速了杭州城市空间变化。屏障拆除之后，西湖便融入城市之中。这样，西湖从郊外

景色转变为城市景区，用当时杭州居民自己的话来形容：“西湖搬进了城。”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浙江省政府划杭县所属城区和部分郊区设立杭州市，组建市政府，奠定了杭州作为现代城市的基本框架。杭州建市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1929年，浙江省政府为了“奖励实业、振兴国产”，即在杭州举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促进了工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本次活动盛况空前、影响深远，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地举办的最大规模博的览会，被誉为中国会展业的开端。以西博会为契机，杭州开始了近代城市建设，城市外围交通路网相继建成，市政设施建设全面启动，公共汽车、自来水厂和电厂等城市公用设施应运而生，改善了市民的居住环境。这一时期，杭州是东南地区农产品的集散地和工业品的中转地。伴随新兴商业街区的形成，杭州商贸日益繁荣，金融业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出现了戏院、电影院、体育场等近代文体场馆。旅游业快速发展，国内游客每年达百万以上；除政界要人、富商大贾、文人雅士频繁来杭外，也不乏来自外国的游客。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杭州进入八年沦陷时期，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就此中断。在日伪的统治下，杭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工商业受到重创，大批学校迁避他乡，文化教育设施和名胜古迹被大量破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杭州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获得了一个发展的重大机遇。杭州的工商界人士筹措资金准备大干一场。但是，重大的发展机遇转瞬即逝。由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惊人的战争费用，导致政府滥发钞票，引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金融崩溃。杭州的近代化进程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杭州城。杭州的解放，使杭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纵观民国杭州这段历史，尽管近代化的进程艰难曲折，但成果还是显著的：杭城逐渐向近代型城市转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布局日趋完善，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更是迈进了近代社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民国时期的执政者不愿也不敢去触碰封建的土地制度，所以那时的发展是畸形的，广大的农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

历史证明，社会的发展一般是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进行的。杭州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也是如此，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解读城市的历史，除了溯源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外，应将城市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综合对比研究，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轨迹。

历年来，杭州市政协非常重视对民国杭州历史文化的挖掘与研究。除征集、出版大量民国“三亲”史料之外，1997年6月由第四届杭州市政协主席周峰主编的《民国时期杭州》正式出版，填补了民国杭州史研究的许多空白。2009年11月，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杭州文史研究会会同民国浙江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民国杭州研究学术论坛”，省内外80多位专家学者对近代化进程中的民国杭州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2010年9月，杭州文史研究会与市社科规划办合作，推出了“民国杭州研究”重点专项研究招标课题。经过专家评审，有20个项目获得正式立项。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国杭州研究丛书”，即是“民国杭州研究”专项课题的成果展示。总的来说，这套丛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全面。丛书涵盖了民国杭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二是体现了历史研究的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等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这个特点在这套丛书中也得到了体现。三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和当代意识。丛书各作者期望通过对民国杭州历史的研究来为当下杭州发展的实践服务。

在这套研究丛书推进的过程中，杭州文史研究会始终坚持严要求、高标准的宗旨，从具体每一部书的研究思路到写作提纲再到成稿，都组织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严格评审，各位作者根据评审意见数易其稿，不断完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力求达到一个总的目标：要使这套民国杭州研究系列专著在学术上能够经得起检验，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民国杭州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于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有待于各界人士的评论指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套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的推出，必将对以后的民国杭州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今日杭州是历史杭州的传承和发展。民国时期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纵深研究，不但大大丰富了杭州的历史文化，而且其所揭示的历史轨迹能够为当前杭州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也可为杭州的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孙忠焕

2011年7月于杭州



# 目 录

|                          |     |     |
|--------------------------|-----|-----|
| 总 序                      | 孙忠焕 | 001 |
| 绪 论                      |     | 001 |
| 第一章 民国初期新闻界的变动           |     | 023 |
| 第一节 民国初期报刊的状况            |     | 023 |
| 第二节 邵飘萍与《汉民日报》           |     | 048 |
| 第三节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         |     | 071 |
| 第二章 新兴媒体的创办              |     | 095 |
| 第一节 杭州的广播事业              |     | 095 |
| 第二节 杭州的通讯社               |     | 107 |
| 第三节 杭州新闻记者公会             |     | 127 |
| 第三章 战前报业的发展              |     | 145 |
| 第一节 丰富的报业和报业活动           |     | 145 |
| 第二节 《东南日报》在大陆的崛起         |     | 178 |
| 第三节 东南日报大厦               |     | 207 |
| 第四章 沦陷期日伪的新闻宣传           |     | 217 |
| 第一节 杭州沦陷与日伪的新闻报刊         |     | 217 |
| 第二节 《新浙江日报》《杭州新报》与《浙江日报》 |     | 226 |

|            |                         |            |
|------------|-------------------------|------------|
| 第三节        | 杭州广播电台·····             | 247        |
| <b>第五章</b> | <b>抗战时期中方的新闻活动·····</b> | <b>256</b> |
| 第一节        | 浙西地区的新闻活动·····          | 256        |
| 第二节        | 临安、於潜、昌化的新闻活动·····      | 274        |
| 第三节        | 淳安的新闻活动·····            | 295        |
| <b>第六章</b> | <b>浙西新闻界的三面旗帜·····</b>  | <b>308</b> |
| 第一节        | 《浙西日报》·····             | 308        |
| 第二节        | 《民族日报》·····             | 331        |
| 第三节        | 《扫荡简报》之回忆与浙西三报之评价·····  | 354        |
| <b>第七章</b> | <b>抗战胜利之初的新闻界·····</b>  | <b>378</b> |
| 第一节        | 日本投降在新闻界的反映·····        | 378        |
| 第二节        | 新闻媒体带来的变化·····          | 386        |
| 第三节        | 《东南日报》回杭复刊·····         | 397        |
| <b>第八章</b> | <b>战后新闻界的回光返照·····</b>  | <b>411</b> |
| 第一节        | 战后报界新局面的呈现·····         | 411        |
| 第二节        | 战后《东南日报》的嬗变·····        | 429        |
| 第三节        | 战后新式媒体的生存状况·····        | 442        |
| <b>第九章</b> | <b>中共各级组织的新闻活动·····</b> | <b>460</b> |
| 第一节        | 中共地下组织向新闻媒体发展力量·····    | 460        |
| 第二节        | 中共地下党员利用报刊进行宣传·····     | 470        |
| 第三节        | 1949年前后杭州地区中共的新闻活动····· | 489        |
| <b>后 记</b> | ·····                   | 497        |

## 绪 论

浙江人杰地灵，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优越，自古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至迟自南宋以来，浙江的文化教育一直比较发达，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人才之盛，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作为浙江的中心，杭州就更不用多说了。至迟自南宋定都以后，杭州不仅有政府官报，而且还有发达的民间小报，至少是中国民间报业和民间报人的一个摇篮。至近代，杭州又临近通商口岸上海和宁波，颇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广大市民迫切地需要了解国内外急剧变动的形势和经济信息。同时，发展近代传播事业的基本条件，如印刷、通信、交通等，也已初步具备。到民国，这些条件又在继续改善和提高。反映到新闻事业上，杭州有着相对较好的新闻事业发展的条件和基础。

### 一

先大致地介绍一下清末的新闻事业吧，因为民国的新闻事业是清末的继续，要了解民国的新闻事业，就有必要首先了解清末的新闻事业。

甲午战争以后，报刊的重要性日益为国人所注意，内容也已从原来的上谕、奏折、宫廷记事方面扩大到介绍西学、议论时政、广译西报新闻。报刊成了人们获取新知识和了解世界形势的新平台。进而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相当数量的报人，热心并倾心于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观念，大量译介欧美法政名著。此举广受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报刊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些革命报刊对革命思想进行了

狂热的鼓吹，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爆发，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

“此次革命推倒满清，固然有赖于军人们的力量，但是海内外人心一致，则是各报馆宣传之功。”<sup>[1]</sup>

“新闻事业是民众和社会底喉舌，大则足以转移时局，小则足以振聋发聩”，这是1929年7月1日《镇海报》的发刊词，很能说明浙江新闻界整体的使命感。浙江有一件十分可贵的事，即朝野对新闻事业的认识一直比较进步。近代以来，浙江人士多有这样的看法，即报馆与议院、学校一样都是兴国之大纲，所以设立报馆应与建学校、设议院同时举行。因此，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杭州也开始创办了报刊。

据统计，从1897年至1911年，杭州共发行过《经世报》《杭报》《笔林报》《杭州白话报》等约20种报纸。这些报纸大多是日刊，少数是周刊、5日刊；这段时期，杭州也有几份小报，如《笑林报》《西湖报》《醒钟报》等。对报刊的作用和影响，《经世报》有一定的认识，它说：“欧人维新，开利喉舌，报馆乃辟，林立于国，政府视为从违，议院倚为声援，学会恃为契助，斯固富强之要删，官民之舌寄已。”

《经世报》对杭州的前途和命运十分关切，它说：“杭州固钱赵旧都，今巡抚所驻，秘书藏阁，精舍诂经，人文之盛齐州罕俪，兹通遐市，聆睹益扩。苟我士夫情切补牢，心存支厦，善甄彼长，亟備己短，赖以凿沌智，保教护种，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尔。”<sup>[2]</sup>1897年，正是维新变法方兴未艾之际。在1897年的维新变法中问世，倡言变法自然成了这份报纸的主导思想和宗旨：“本报不敏窃取此旨，愿与各新报翕效嚶鸣，自固气类，隐存春秋经世之责，无忘同舟共济之怀。”<sup>[3]</sup>在第一册的《经世报论说》中，刊登了章太炎写的《变法箴言》，详尽阐述了变法图强的认识 and 意义。可以认为，这篇论说不仅反映了章太炎当时的政治观点，而且也体现了《经世报》日后的办报思想。

从光绪中期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杭州也办了多种杂志，如《商务

[1] 孙中山：《对粤报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2] 《〈经世报〉例言》，《经世报》1897年第1期，第1页。

[3] 同上。

报》《工艺报》《蒙学报》《算学报》《农工杂志》《商业杂志》《杭州商业杂志》《著作林》《浙江教育官报》《译林》等约10种，其中与经济有关的杂志不少。《译林》1901年创刊，林白水任主编，以翻译和介绍西方学术，宣传西学，主张变革社会为主要目的。《译林》在杭沪一带有一定影响，1901年4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汇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杭州志士创办《译林》，第一期出书后，定购者多。余中丞以其足以开拓风气，变化性情，故饬各属员各业书院学堂一体购阅，并以此事为属员学生之考成。”<sup>[1]</sup>这表明当时翻译介绍近代经济和近代科技知识的杂志在杭城受到欢迎，市民阶层大量订阅，官府也大力推广，各级官吏、书院学堂的学生不仅要阅读这些杂志，而且这些杂志还被用来对他们进行考核。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创刊的《著作林》为了满足一些文人发表大作的欲望，同时也为了“创收”，有向作者收取版面费的做法：“凡关近世名人逸事伟迹之稿，须纳刊资二元。写真半页，须付报费五元，附刊专集，每字收刊资洋二厘。”<sup>[2]</sup>这也可谓是当时萌生不久的市场经济在新闻界的一种反映。

然而，清末杭州的新闻事业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要比内地发达，但又要比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落后，如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比较，杭州近代报刊问世的时间比较晚，数量也比较少。而且，除了《杭州白话报》和《危言报》外，其他报刊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少则几个月，长则三四年。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经济因素。

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与商品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清末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即使是那些工商业较发达的大城市，市场经济也没有很好地发育，杭州自然就更次之了。那时要创办和维持一家报纸或杂志，除了靠社会捐助和同人集资外，只有靠发行收入，从市场中获利几乎是没的，即使有，也微不足道。而发行收入又极不稳定，这是因为：第一，印刷技术还很落后，《杭州白话报》《著作林》创刊

[1] 转引自徐运嘉、杨萍萍编著：《杭州报刊史概述》，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2] 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之江日报社1930年印行，第43页。

初期，都是木刻，因此往往误期，以后才改为铅印。有的报刊，还是石印，甚至还有手抄的。就是有印报机器，也是手摇的。<sup>[1]</sup>第二，交通毕竟还不发达，报刊传递费时费日。第三，社会上，朝野还很看重科举仕宦，鄙视新闻事业，绝大多数人毕竟文化程度不高，也不富裕。所以，清末杭州的报刊发行量都很少，如全国创办最早的白话报纸《杭州白话报》，很受人欢迎，订户基本上为“普通住民”，但发行量也不会超过800份。<sup>[2]</sup>所以，清末虽然涌现出一大批全国乃至海外一流的杭州籍或浙江籍新闻工作者，但是他们都不在杭州打天下，至少他们“创牌子”的地点不在杭州。

## 二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从1912年至1927年国民政府上台前，大致算为民国早期。在这之前，1911年11月5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杭州发动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虽然，和全国一样，浙江的辛亥革命并不彻底，但是毕竟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从1912年至1927年国民政府上台前，大致算为民国早期。在这之前，1911年11月5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杭州发动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11月18日，代表了革命派利益并起着浙江都督府机关报作用的《汉民日报》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问世。12月8日至13日，该报连续刊发《敬告东南报界同志注意》的告示：“汉族革命之所以成功，其原因甚为复杂，然报纸之提倡，不可谓非重要原因也。虏廷所在之地，报纸之势力未易遍行，故东南各省风起云涌同举义师，而京津一带声气隔绝，尚在醉生梦死之中，兵连祸结，徒苦同胞，旷日持久且生他变。现由本馆同志发起，拟在天津组织

[1] 项士元：《浙江新闻史》，之江日报社1930年印行，第6页。

[2] 《杭州城报纸销数表》，《浙江潮》1903年第3期，第195页。

秘密印刷所，来辑录东南各报，翻印发行，冀以唤醒同胞，早歼胡虏。凡我报界同志宗旨既同，倘求为赞助。见此广告，祈各寄报一份，由日本邮便寄递天津日本邮局，畀某等自行往取，并乞将寄发日期通告本馆以接洽，不胜祷祝之至。”在本地区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杭州新闻界头脑清醒，表现出一种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要用报刊唤醒其它地区的人民，把革命推向清政府统治的中心。不幸的是，天津的秘密印刷所不久为袁世凯势力所破获，其人员或死或被抓。不过，《汉民日报》也曾收到一封来自天津法租界平安里41号《民意报》的专电，说：“北方黑暗，宜速设新机关。现组织一《民意报》，专以宣布民党意见为宗旨，定期冬月初一出版，请为宣告。又拟与各报交换一份。”<sup>[1]</sup>

和全国各地一样，浙江的辛亥革命并不彻底，但是它毕竟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1911年12月20日，《汉民日报》公布了浙江临时议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习称《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sup>[2]</sup>），浙江的这部约法在人民权利和义务方面宣布：“人民有保有财产之自由、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书信秘密之自由、迁徙居住之自由、信教之自由”。<sup>[3]</sup>虽然《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只是一部地方法律文件，但是它是浙江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新闻事业在内言论出版事业明确地予以了法律的尊重和保障。随后的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更是在国家宪法的层面明确地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sup>[4]</sup>和全国各地一样，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下，代表不同派别、不同政治势力的政党或议员势力集团在杭州、浙江出现了。

[1] 《本馆本电》，《汉民日报》，1911年12月20日，新闻第2版。

[2] 以往的论著（如《浙江通史》、《浙江辛亥革命史》等）均认为《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于1912年1月22日制定或公布，这是不准确的。1912年1月22日是《中华民国浙江省约法》在《浙江军政府公报》上公布的日子。《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于1911年11月15日在《汉民日报》上公布。

[3] 《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浙江军政府公报》，第1册，1912年1月22日，第2页。

[4] 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13288.htm?fromid=107494>。

为了扩大影响范围，他们把注意力投向新闻事业，或自己办报刊，或出钱支持别人办报刊。这样，与全国各地一样，杭州和浙江的新闻事业也从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中得到了一个自由和兴奋的机会。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全国各地创办起一大批报刊。据统计，1912年全国的报纸约有270家，比1911年时已有的近百种增加了约3倍。<sup>[1]</sup>在杭州，辛亥革命以后也出现了许多报刊，其中仅1912年一年，杭州城内就出了12种报纸、4种杂志。这些报纸有《之江日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数十种，杂志有《道路杂志》《钱江评论》《实业丛报》等数十种。1918年8月，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5个月，他在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其中就有来自杭州的《之江日报》。这时期，今天杭州所属的各县，也开始出现了报刊。1922年11月27日，萧山创办了《责任》周刊，这是一份研究农民问题的刊物。余杭创办了报纸《余杭报》，大约在民国初年问世。

上面讲了，代表不同派别、不同政治势力的政党或议员势力集团在各地的出现，促进了报刊的发展，但是他们也给民初报刊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民初政党分歧，报纸牵入政争的漩涡，部分言论不免偏颇。亲袁的报纸，‘虽袁违法昭彰，无可掩饰，亦辄以维持大局等词，为之解脱。民党稍伸公论，则诬诋之无所不至’。”“民初报界另一种缺失，便是一任情感奔放，漫无理性节制。时庶政不修，百废待兴，而朝野哄争，政局日趋险恶。在这一黑暗政治背景下，国人养成一种不正常的阅报心态，未读到淋漓刺激的评论或记述，便感到不痛快。报纸言论刺激性愈烈，所受之赞美便愈多，于是记者一切言论，‘唯以自身所感受之不正当的刺激而发之感情，转以刺激他人’，结果产生了不良的‘副作用’，戴传贤指出，‘中国今日之凹凸不平，争斗不已，与夫其畸形的态度，何一非由望平街所发之刺激剂而生！’这对报人立言，足可作为鉴诫。”<sup>[2]</sup>所引所述的情况，在杭州新闻界也是难以避免的，上

[1] 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二，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63页。内有《浙西公报》一种，这是杭州暨浙江目前有关新闻史的论著及志书所未提及过的。

[2] 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日报社”1981年编印，第24、25页。



述民国成立后出现的报刊中，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对民国杭州新闻界的风波，过去我们论及总是泛政治化或泛意识形态化，现在我们平心而论，是否不应该忽视或回避新闻界的自身责任？

这时期新闻事业新发展的标志是杭州出现了4家通讯社，它们是1912年成立的民国新闻社，1924年成立的国民通讯社和耳棣电讯社，另一家则是1927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办的浙江国民通讯社。

这时期新闻事业新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新闻团体的出现。1910年9月4日，上海、江苏和浙江的记者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新闻职业团体——全国报界俱进会。杭州暨浙江的记者也积极筹建新闻团体。1912年1月16日，《汉民日报》刊登启事，发起筹建浙江报界公会，通讯处设在汉民日报社内。当时《汉民日报》的主笔是邵飘萍，这个浙江报界公会也由邵飘萍主持。1913年，浙江报界公会改为杭州报界公会。

但是，从1912年至1927年上半年，除《之江日报》(1913—1937)、《浙江商报》(1921—1949)、《浙江民报》(1913—1932)外，其他报刊存在的时间都不长，甚至仅昙花一现。此外，这时期报刊办得也较为平凡，没有突出的成就，浙江籍的知名报人如邵飘萍、陈布雷等继续在外地风光。

究其原因，政治是一个方面。那时，时有大小军政官员查封报刊、逮捕关押新闻工作者的事件发生，如1913年政府以“攻击省军政执法处长许畏三”的罪名，封闭了《汉民日报》，逮捕了主笔邵飘萍(他出狱后即离杭他去)，等等。但是，另一个主要的方面，仍是经济发展问题。

杭州地处两浙的中心，又是旅游胜地，商业素来发达，著名的手工业品杭纺、杭线、杭粉、杭烟、杭剪等，名闻海内外。但是，在封建时代，商业从属于封建经济，发展十分有限。辛亥革命冲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还在1909年，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杭州城站成了客货运的枢纽，随之大批旅馆、饭馆、照相馆在城站相继开设，使城站形成以接待旅客为主的新商业区。辛亥革命后，清朝八旗兵在杭州的驻防营地也被改造成以商业和旅游业为主的新市场，成为杭州的闹市区。加上原有的以经营木材柴炭为主的江干市场，以米行、纸